

比较文学文献学：作为总体研究方法的目录与索引*

张哲俊

摘要：比较文学文献学是以阅读书目校注交流关系的方法。校注一本诗集的交流关系之后，应当以适宜的方式统计与记载所有交流关系的信息，目录与索引是最为适宜的方式。交流关系的总体数据与款目数据，可以作为总体研究交流关系的依据。此前总体研究交流关系，基本依据总体印象，但其研究结果未必可靠。编制交流关系信息的目录、索引与数据，应当是总体研究交流关系的方式。

关键词：目录 索引 总体数据 总体研究

一、总体研究与目录、索引的细化数据

比较文学文献学以校注方式研究交流关系，完成了校注，也就等于完成了研究交流关系的任务。但除了校注每一首诗歌的交流关系之外，还需要研究交流关系的总体状态，这就需要统计交流关系的总体数据。如何统计、记录与分析，是必然面临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是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乐府的文学与音乐（23FZWA010）”研究成果。作者系延边大学/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

计量文献学的任务。^①国内外学者已经利用计量文献学研究文本的形成、真伪等问题，比较文学文献学也可以利用计量文献学研究交流关系。交流关系也是文本形成的一部分，完全可以使用计量文献学。比较文学文献学与计量文献学存在天然的近缘关系，交流关系终究是交流信息，计量文献学所做的就是信息管理与研究。不过比较文学文献学没有必要全部移用计量文献学的方法，但可以根据校注本的需要采用适当的方法：比较文学文献学需要阅读书目、潜在书目的清单。这一清单实际就是目录，根据这个目录需要调查校注需要使用的文献用例，因而这个目录是交流关系的基础数据。其他数据是在这一数据基础上产生的，对校注者与研究者都有重要的价值。索引是校注本常用的方式，常规款目是人名、地名、书名、篇名等。此类款目可以承载交流信息，但只有常规款目不能满足研究交流关系的需求，还需要根据不同的交流形态设置款目。索引款目应当具有统计不同交流信息数据的功能，还应提供每一条交流信息的所在位置。研究者可以便利地查找交流信息及其篇目、语词与实证文献，这是研究最实用的价值之一。

从阅读书目的目录到语词、事物用例的索引，是由大而小的细化过程，也是产生基础数据与总体数据的过程。首先产生的是阅读书目的目录，这是细化目录、索引的起点。古典目录学的研究也需要经历

① 中国多译为文献计量学，是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文献统计分析法、引文分析法较近于交流关系的计量方法。日本学界称之为计量文献学，参见：伊藤瑞毅编著『三大秘法抄なぜ真作か：計量文献学序説』（東京：隆文館，1997年）、『計量文献学の射程』（東京：勉誠出版，2016年）、村上征勝『シェークスピアは誰ですか？：計量文献学の世界』（東京：文藝春秋，2004年）、土山玄『計量文献学による「源氏物語」の成立に関する研究』（博士論文，2015年3月22日），等等。比较文学文献学是根据阅读书目校注的方法，阅读书目的用例类似引文，校注类著作可以利用目录、索引来统计交流数据，并在数据基础上分析交流关系的总体状况。国内成果不多，主要有王笛《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计量文献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计量标准化，计量标准是判断的依据，对科学、医学、社会科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对比较文学文献学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无法确定网状关系与常见关系的标准值，虽然交流信息的计量可以显示交流关系的总体状况。

细化过程，从了解书目到了解书目的提要，再到了解书目的全部内容。这是研究学术的一般过程，研究交流关系亦不例外。从调查阅读书目，到产生阅读书目的目录，到产生交流关系的篇目，再到确证包含交流关系的语词。从阅读书目的目录到语词的索引，就是从目录到索引的细化过程。2010年笔者曾提出比较文学文献学应当始于目录学的构想，并以为比较文学目录学是细化目录的过程：“目录总是根据研究的对象与主题有所变化，从而深化与细化。”^①“研究过程中还要进一步确立和搜寻更为细小的研究对象，生成更为细小的目录，这是以浦岛子传说中的各种因素为单位重新排列的目录，这个目录会把学者带入更细更深更深的故事形态演变过程的考察之中。当然一般不会把这个细目的建立过程看成是目录学，但在我看来这是目录学的细化深入的延伸过程。”^②撰写此文时只是朦胧感觉到比较文学目录学的推进方向，但以阅读书目校注与研究交流关系之后，就明确了推进方向。

古典目录学可以产生提供书目、版本信息的工具书，也可以是生长原始研究的起点。现今学术研究不大始于目录学，大多始于概念、理论，或始于先行研究，这成了学术研究的常规动作。从事目录学研究的学者专注于目录、版本的著述，不大涉及目录学与研究路径的起始关系。不过始于目录学的研究路径距今并不遥远，有必要重新认识这种研究路径：“离我们不算太远的王国维的学术，就是从目录学开始的。王国维的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戏曲史的研究，戏曲史的代表作是《宋元戏曲考》（《宋元戏曲史》），撰著于1913年。那么应当思考的问题是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是如何展开的，他最是从目录学开始的。‘1908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三十二岁。9月，辑《曲录》初稿二卷。又手录明抄本《录鬼簿》，并作《跋》。’《曲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曲录》就是一本目录学著作，辑录了戏曲作品目

① 张哲俊：《辉煌学术的发生与发展》，《严绍璿学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录，其中有传世的作品，也有只是存目的作品，还有残篇存世的作品。‘1913年，癸丑，民国2年，三十七岁。1月，撰成《宋元戏曲考》，并作序（后易名为《宋元戏曲史》）。’从王国维撰著《曲录》入手，最终完成《宋元戏曲史》，两者的关系看得一清二楚。《曲录》这本目录学著作，是《宋元戏曲史》的基础，没有目录学的起始工作，后面所有的研究都是不可能出现的。”^①目录学著作的价值在于记述书目、版本，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从目录学生长出原始创新的著作。

《曲录》也可以看成是普通的工具书，但决不是普通的辞书，只是用来查阅相关信息的工具书。《曲录》是拥有着极大学术生命力的目录学著作，在此基础上能够生长出极其伟大的学术。^②

王国维为了研究戏曲文学史，首先调查了中国宋元时期出现的戏曲作品，写出了《曲录》，也就有了戏曲作品的清单；研究了《录鬼簿》，也就有了曲家的清单。有了作品目录与曲家目录，也就可以展开更细致深入的研究，也就是在《曲录》与《录鬼簿》的基础上，写出了古代戏曲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宋元戏曲史》。《宋元戏曲史》是原始创新的著作，在此之前没有出现过同类著作，原始创新的研究尤其需要从目录学开始研究。但如果已经有了目录学著作，也就不需要重复，正是这一原因王国维没有自己撰写《录鬼簿》，而是研究了《录鬼簿》，

① “这是普通的辞书所不具备的，普通的辞书只能是辞书，不会有生长出诸多原创性的学术研究。现今提到王国维的学术方法，就会想到地上地下的二重证明法，几乎完全忘记了由目录学到专门史的方法。《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的代表性著作，将《宋元戏曲史》放在前面，《曲录》放在后面，或者根本不会提及《曲录》。其实这是本末倒置，完全没有明白王国维学术的科学方法。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现今的文学史或专门史，往往不是原创性的学术，只是根据已有的文学史之类著作，只要对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提出些许自己的看法就可以了。这就完全省去了目录学的部分，目录学显得完全没有价值，也只能把目录学著作看成是无益的东西。这当然是完全不懂得科学治学方法的结果。”（张哲俊：《辉煌学术的发生与发展》，《严绍璎学术研究》，第5页。）

② 张哲俊：《辉煌学术的发生与发展》，《严绍璎学术研究》，第5页。

这是科学的方法。

如果研究对象不是文体文学史或断代文学史，而是校注一本别集的交流关系，那么几乎都需要从目录学开始，迄今还没有出现过以阅读书目校注交流关系的个案，这样所有个案都将是原始研究。目录学的研究起点在比较文学文献学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如果具备调查阅读书目的条件，就应当从调查阅读书目的目录开始，从目录再进入索引层面。阅读书目的目录与王国维的《曲录》不同，两种书目的目录不在一个层面：一个是一般书目的目录，一个是阅读书目的目录。从一般书目的目录到阅读书目的目录，已经大大地缩小了书目层面的调查范围，但还需要继续细化，必须沉入更细的篇目、语词层面，提供三个层面交流关系的目录、索引与数据，这是交流关系的基本特征决定的。

其一，交流关系的三个层面与基本层面。比较文学目录学必须细化的原因有二：一、交流关系存在于书目、篇目、语词等三个层面，这样必须记录三个层面的交流信息，才能提供交流关系的排查结果。如果只记录书目层面，没有细化的索引，那么记录的交流关系必然残缺不全，无法记录排查交流关系的结果。二、语词是交流关系的基本层面，目录、索引不能停留在书目层面，必须深入到语词的基本层面。如果不能确定基本层面的交流关系，书目、篇目层面的交流关系也难以确定，从目录到索引的细化过程是必由之路。下面来看看瑞溪周凤《香影斋》诗的交流信息与编制索引的关系问题。

香影斋

未可行寻雪后林，庭梅春浅胜春深。

小横枝上乾坤在，移得孤山入冻吟。^①

① 瑞溪周凤「臥雲藁」，「五山文學新集」卷五，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572頁。

香影斋在京都闹市区，在瑞溪周凤友人有牧老人的今是庵。香影一词的交流信息似乎比较简单，瑞溪周凤以为香影斋的名称来自林逋的诗歌，孤山即指林逋。这是诗人自己在诗歌文本中记述的，这个说法自然无误，但这未必是全部的交流关系。诗人不需要在诗歌中记述所有的交流关系，事实上诗人自己也未必记得都在哪些书中看到过。如果在诗歌中勉强记录更多的交流关系，恐怕就难以写成诗歌。香影二字出于林逋《山园小梅》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广为流传的名句，从两句中各取一字构成香影一词。瑞溪诗歌的香影与孤山、林逋的关系，也证明香影二字源于林逋的诗歌。《山园小梅》载于阅读书目林逋的《林和靖集》卷二，这里已经有了书目、篇目、语词，三个层面连成一体，编制索引必须从书目细化到语词，这是与古典目录学的不同之处。不过交流关系的实际状况更为复杂，语词用例与篇目的关系比较稳定，但篇目名称时有变化。阅读书目宋代吕祖谦《宋文鉴》卷二四载为《小园梅花》，《山园梅花》与《小园梅花》篇名不同，这种情况在古代文学中并不罕见。不同篇名对交流关系可以没有影响，但也可以成为影响交流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主要取决于瑞溪的《香影斋》诗中是否存在篇名的印迹：如果存在《小园梅花》的篇名印迹，那么《宋文鉴》将是交流关系的典据；没有篇名印迹，《宋文鉴》只能是典据范围的阅读书目。这些信息将会直接影响编制索引：或记入于典据，或记入于典据范围，不同的编制会产生不同的细化索引。

林逋的《山园小梅》是名篇，载于很多书目，即使缩小到阅读书目范围，也有不少书目。香影一词来自林逋的《山园小梅》，但不等于必然来自《林和靖集》。还有不少阅读书目也收录了《山园小梅》，或者收入完整诗歌，或者引用部分诗句。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八《山园小梅》《评和靖梅诗》、宋曾慥《类说·陈辅之诗话·体物赋情·林逋咏梅》，《锦绣万花谷前集·梅》，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梅花》，《咸淳临安志·纪遗三》，《朱子语类》，《东坡志

林》，宋欧阳修《文忠集·归田录》，宋黄庭坚《山谷集·题跋书林和靖诗》，元方回《瀛奎律髓·梅花类》，宋阮阅《诗话总龟》卷七、八、九，《诗话总龟后集·隐逸门》，《诗话总龟后集·咏物门》，《诗话总龟后集·咏物门》卷二八两例，《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七有三例、卷三二有一例，《渔隐丛话后集》卷二，《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一，《诗人玉屑》卷六、十七与《诗林广记后集》卷九，以上都是收入林逋《山园小梅》的阅读书目，都是交流关系的范围，应当都列入目录或索引与数据。但全部记录于索引，索引必然极度膨胀，这些书目已记录于校注，完全可以根据瑞溪诗歌的篇名检索到这些阅读书目，找到这一典据范围的阅读书目。

其二，阅读书目的不同文献用例，必然产生不同的交流关系，也就需要在索引中编入更多的交流关系。林逋的《林和靖集》没有香影一词，但阅读书目有香影用例，由于语词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交流关系。两种不同语词的交流关系，都存在于语词层面，但需要进一步细化。语词层面是最细层面，无法进到更细层面，但在索引中可以增加一条典据范围。下面是阅读书目的香影用例，《全芳备祖前集·五言古诗散联》：“桃花女昭君，服饰靓以丰。徘徊顾香影，似为悦已容。”^①《锦绣万花谷前集·金华殿中》：“风定玉炉香影直，日融金掌露华鲜。”^②《江湖小集》卷三十八叶茵《顺适堂吟稿·自和》：“岁寒独有梅花月，香影年年到户除。”^③古代诗人将香影一词作为了林逋《山园小梅》甚至是林逋诗歌的标志性词汇，阅读书目《元风雅后集·李綱斋》：“诵净植之说，吟香影之诗。又若亲炙濂溪之旁，而徘徊孤山之

① [宋]陈景沂编辑，[宋]祝穆订正，程杰、王三毛点校：《全芳备祖》卷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17页。《全芳备祖前集》的诗句来自宋韩驹诗《次韵程致道馆中桃花》：“桃花如昭君，服饰靓以丰。徘徊顾清影，似为悦已容。”（《陵阳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75页）别集的“清影”在《全芳备祖前集》中误为“香影”，“如”字误为“女”字。

② [宋]佚名辑：《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4册，第100页。

③ [宋]陈起编：《江湖小集》卷三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7册，第307页。

下也。”^①“香影之诗”指林逋的《山园小梅》诗句，香影一词在宋代十分流行。五山诗歌的香影一词可能直接来自收入林逋诗歌的阅读书目，也可能来自存在香影一词的阅读书目，这样在索引中就会是两条典据范围。

其三，本事典据与用例典据不同，索引应当记录本事典据、本事典据的范围。日本诗人在诗歌中使用中国的典故，典故有语词用例，也有本事用例，两种用例可以合一，也可分离。如果语词用例与本事用例分离，就又会增加一条交流关系，这样同一语词最多可以产生三条交流关系，都需要记入于索引，可见语词层面仍然需要继续细化。本事典据范围与索引的关系可见后文《袁安洛雪》的本事。一般来说同一语词会产生一条交流关系或两条交流关系，同时出现三条交流关系并不常见。书目、篇目、语词等三个层面的联动与分合关系，使交流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这可以体现在索引的典据或典据范围的数据。

比较文学目录学的具体形态是由研究交流关系的任务决定的。目录、索引并不陌生，一般以为目录、索引只有工具功能，没有研究性质。但是比较文学目录学的目录、索引与数据，既有工具功能，也有研究性质：

其一，目录、索引是描述交流关系的总体状况与基本特征的方式，也是总体研究的依据。比较文学文献学的任务是研究与记录交流关系，如果只是记录别集每一首诗歌的交流关系，校注就可以直接完成任务。然而交流关系散见于校注，难以总体描述与研究。汇总所有的交流关系，可以得到新的数据，这是以往的校注未曾提供的总体数据。总体数据是总体研究的需要，是交流关系研究的重要部分。总体数据是由汇总数据与细化数据组合而成，这是数据群，数据相当庞大，不是校注本的前言可以承载的，这样必须将目录、索引、数据作为记录与描述总体状况的方式。这样既可以提供每一交流关系的所在位置，可以

^① [元]孙存吾辑：《元风雅后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8册，第142页。

保持索引的工具功能，也可以为总体研究提供总体数据，在此基础上可以展开客观准确的研究。在此之前总体研究只能依赖于总体感觉或印象，即使总体感觉或印象没有偏差，依然需要总体数据的支撑，否则实证研究的价值落空。以往交流关系的总体研究，一般采用以若干交流关系替代总体交流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可靠，但在未曾以校注研究交流关系之前，只能采用这种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校注类著作比一般研究著作更需要目录、索引与数据。然而现实是校注类著作一般只要完成了校注，就完成了任务，不会提供总体数据，这就等于放弃了彻底实证的可能性。

其二，目录、索引、数据与研究交流关系的意义。也许有人认为目录、索引、数据未必有用，文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不同，思想、情感与艺术感觉、体验等文学性的研究，并不一定需要总体数据，更重要的是细读文本的体验与分析、阐释。特定语词出现数量较多，未必是诗人表现的主要思想；出现数量较少或者完全没有，也不等于不是诗人的主导思想。文学性研究是客观性较差的一种研究，目录、索引与数据提供的总体数据，虽然不无益处，但未必有太大的助益。然而交流关系的研究与文学性研究不同，研究的是交流关系的纯粹事实，只要能够保证目录、索引、数据精确无误，就完全可以说明交流关系的总体状况。这是强调目录、索引、数据的原因。对比较文学学者来说，最好是提供全面的交流信息，一本校注在手，既可以了解每一首诗歌的交流关系，也可以通过目录、索引与数据，全面了解文集的交流信息。以校勘、注释的方式研究交流关系，编制汇总的交流关系信息，同样也可以产生学术著作。将校注作为研究比较文学交流关系的新平台，可以展开各种研究动作，从而得到未曾有过的新成果。

其三，比较文学文献学的索引与一般索引的差异。比较文学文献学索引的编制依据不是别集的所有字词，而是别集语词的交流关系。绝大部分的交流关系存在于校注之中，校注之前无法编制索引，但校注之后可以汇总数据，这样索引既有工具功能，也有研究性质；既提

供字词的所在位置，也提供交流关系的类型与位置，据此还可以查到相关的文献用例。一般索引的编制依据是别集文本的所有字词，没有任何校注也可以编制，目的是提供有序排列所有字词的位置，以便于查找全部字词的所在位置。这样的索引只有工具功能，没有研究性质，今天已经不大需要编制此类索引，只要录入为电子文本，就可以替代一般索引。一般索引没有丧失工具功能，但远不如电子检索方便，也就等于丧失了索引的价值。现今编制交流关系的目录、索引与数据，也依赖于电脑与专门软件，大大改善了研究条件。但电脑软件不能提供一切，还是需要相当艰巨的人工研究与操作，数据过于庞大，也就难免错漏。虽颇为无奈，但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二、交流信息与目录、索引的数据款目

总体数据是由不同款目的数据群构成的，款目又取决于交流关系的相关因素与总体特征，也取决于工具功能。

第一，阅读书目、潜在书目的目录性质与具体形态。

以阅读书目校注需要阅读书目的目录，在阅读书目目录的范围内寻找校注的文献用例，据此可以确定交流关系。校注之前阅读书目的目录只是存在交流关系可能性的范围，没有确定交流关系，就不会存在交流关系的位置，也就无法标出诗歌编码或页码，无法编制有效阅读书目的清单。目录的特征是标出所示内容的位置，但调查相关文献得到的阅读书目，没有可以标出位置的信息，因而不是目录，只能算清单。这种清单可以认为是阅读书目的准目录，为了方便使用，阅读书目或者按照笔画或拼音记录，或者可以按照经史子集记录。这是前目录、索引的阶段，最终会在准目录的基础上产生索引。与阅读书目清单最近的是书名索引，但不能合并，只能各自独立：其一，阅读书目的清单与书名索引性质不同，无法合并，这是从交流关系的可能性到确认交流关系的变化。编制书名索引的前提是存在交流关系的所在

位置，可以编入书名索引，但阅读书目清单无法编入书名索引。其二，阅读书目的清单必须作为独立款目，才便于调查与使用。校注时经常需要回到阅读书目，并在阅读书目清单的范围内寻找文献用例，或者确认特定书目是否为阅读书目，这是阅读书目清单的工具功能。

瑞溪周凤《袁安洛雪》的诗题来自中国文学，既出现于一般书目，也出现于阅读书目的清单。一般书目的诗题能否成为补遗阅读书目的依据，或阅读书目清单的书目能否编入索引，取决于调查的结果。

袁安洛雪

风雪洛阳埋屋时，身宁冻死节何移。

孝廉一举起高外，我不干人人自知。^①

袁安洛雪，是中国的十雪题咏之一，咏袁安大雪僵卧洛阳房中之事。诗题典源为南宋方凤《存雅堂遗稿·怀古题雪十首·长安落雪》：“朔风琼粉如筛堕，四望民居绝烟火。路无行踪门反关，珍重先生独僵卧。洛阳令尹举孝廉，三冬喜爱照河南。有志何妨屡迁擢，要以清操除奸贪。”^②此诗写的是长安，而非洛阳，《存雅堂遗稿》不是阅读书目，不存在编入书名索引的可能性。那么《十雪题咏》是否见于阅读书目清单的书目呢？阅读书目《元风雅后集》卷十二袁安道《袁安卧雪》写的是洛阳：“世界琼瑶别一船，出门半步即风寒。飞花上下山河异，卧榻中间天地宽。无过客来行迹少，作干人态此时难。立身大节当然耳，岂意清高却得官。”^③袁安道的《袁安卧雪》与瑞溪的诗题名称不同，说明瑞溪周凤的诗题未必来自《元风雅》，或者瑞溪周凤的诗

① 瑞溪周凤「臥雲藁」，「五山文學新集」卷五，525頁。

② [宋]方凤：《存雅堂遗稿》卷二，《全宋诗》卷三六一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342页。

③ [元]孙存吾辑：《元风雅后集》卷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8册，第169页。

题讹误，或者变异，这关系到校勘和变异。但进入古典目录学层面调查，就会发现《四部丛刊初编》的《皇元风雅》内，此诗题为《袁安洛雪》。瑞溪周凤的诗题显然来自《四部丛刊初编》版本系统的《元风雅》，完全可以确定二者发生过交流关系。阅读书目清单是调查日记等相关文献得到的，一般而言相关文献不会直接记载版本信息，因而阅读书目清单没有版本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古典目录学的调查，不同版本会有不同的字词，这也是阅读书目清单能否变成书名索引书目的依据。比较文学目录学与古典目录学在此重合，这是两种目录学的重要关系。在确定瑞溪周凤《袁安洛雪》与《元风雅》的交流关系之后，《元风雅》就不是没有交流关系位置的书目，交流关系存在于瑞溪《袁安洛雪》的诗题，诗歌的编码应当记录《元风雅》，这样就可以编入书名索引。根据书名索引可以查到《元风雅》与瑞溪的《袁安洛雪》的交流关系，但阅读书目清单没有这种可能性。

潜在书目（交游圈别集）是另一种阅读书目，也是交流关系的另一形态。潜在书目是由交游圈诗人的名单决定的，交游圈诗人的别集都是潜在书目。潜在书目是交游圈诗人的人名清单或别集清单，同样也没有交流关系的位置与诗歌编码。但只要确定了交流关系，也可以产生位置与编码。除了瑞溪周凤的《袁安洛雪》之外，五山文学还有其他的《袁安洛雪》诗歌，全部出于交游圈诗人的别集。西胤俊承《真愚稿·袁安洛雪》：“饿殍填沟雪未除，干人应槁傍门闾。何知累世台司贵，尽出弊庐僵卧余。”^①惟肖得巖《东海琼华集·袁安洛雪》：“纷飞乱落几多般，铁笠衣棱刮骨寒。人倚介山夸闹热，独僵雪屋乐间宽。”^②南江宗沅《渔庵小稿·袁安雒雪》：“态不干人屋似村，饥肠三日雪埋门。只缘幸〔夸〕屈雒阳令，卧见阶前新履痕。”^③这是《袁安洛雪》诗题在五山文学的分布，是《袁安洛雪》典据范围的一部分。三

① 西胤俊承「真愚稿」，《五山文学全集》卷三，东京：思文阁，1973年，2727页。

② 惟肖得巖「东海琼华集」，《五山文学新集》卷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8年，824页。

③ 南江宗沅「渔庵小稿」，《五山文学新集》卷六，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2年，141页。

本别集也都有了交流关系的共同位置与编码，就不再只是潜在书目清单的书目，可以编入书名索引与人名索引，并从书名索引与人名索引找到交流关系的信息。

潜在书目是瑞溪周凤交游的诗人别集，但还包括了瑞溪弟子横川景三交游的诗人别集。合并两个交游圈的纽带是横川景三，这个纽带是否存在，也需要数据来证明。这样就应当将横川别集作为索引的款目，从而了解横川别集用例的分布与数据，这一数据可以证明横川是否确实为两个交游圈的纽带。在获得这一数据之前，也可以感觉到横川的纽带作用，但只能用相当丰富之类的模糊语词描述，这是无奈的描述：如果一一举证横川别集的用例，就会无休无止地罗列文献，所占篇幅与实际价值完全不匹配。这里需要的不是描述个例，而是可靠的总体数据，这个数据只能通过索引调查得到。索引及其数据并不是简单的工具，也是描述交流关系总体状态的方式。在瑞溪周凤《卧云稿》的校注中，横川别集的用例有366条。^①如何解读这一总体数据，是总体研究的一部分。《卧云稿》共有532首诗歌，横川景三的用例有366条。《卧云稿》一多半的诗歌都有横川别集的用例，这是相当惊人的数据，可以证明合并两个交游圈的纽带是横川景三。合并两个交游圈是在确定交游圈别集，也是总体研究的一个问题。

第二，语词、本事与典据、典据范围的索引。

典据、典据范围是交流关系的两种基本形态。存在位置与编码，可以编入索引，这是最重要的索引。典据、典据范围隐含了阅读书目、篇目、用例以及相关考证，如果这些因素都作为索引的款目，索引必然臃肿不堪，不便查索，丧失工具功能。编入索引只能简化交流关系，简化的最小限度是典据、典据范围，典据、典据范围应当作为款目。根据典据、典据范围的索引，可以回到特定诗文，可以查到相关的交

^① 参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张哲俊《瑞溪周凤〈卧云稿〉的校注与研究》。

流关系。典据、典据范围索引的另一功能是调查与统计总体数据，为此就需要记录每一首诗歌交流关系的数据，这就具有了统计总体数据的基础数据。典据、典据范围的总体数据，其实也是交流关系的全部数据，其他款目的总体数据只是典据、典据范围总体数据的一部分。编制典据、典据范围索引的一个比较特别问题是典源，典源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典源同时也是典据或典据范围，那么应当作为典据或典据范围编入索引，这种状况还是较为常见。其二，典源不是典据或典据范围，但不等于完全没有交流关系，典源通过典据、典据范围存在间接的交流关系，间接的交流关系不是记入索引的依据。瑞溪《袁安洛雪》诗题的典源是《存雅堂遗稿·长安落雪》，但《袁安洛雪》与《长安落雪》之间不存在交流关系，至多是通过《元风雅》的《袁安洛雪》产生了间接关系。这似乎是两可的问题，但典源书目不是阅读书目，也就不能编入典据、典据范围的索引，不过典源书目可以见于书名索引。总体数据从无到有，不是单纯数据，是呈现交流关系总体状态的方式。这是工具功能与研究功能合而为一，提供总体数据是一种研究，解读总体数据是进一步的研究。

《袁安洛雪》的诗题有一个用例典据，还有本事典据的范围，这是同一交流的不同来源。袁安（？—92）字邵公（一作召公），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商水西南）人，东汉名臣。仅从《元风雅》的《袁安洛雪》还不能了解袁安卧雪的完整本事，不过其他阅读书目记载了袁安洛阳卧雪的本事，《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祖父良，习孟氏《易》，平帝时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安少传良学。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初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辞不肯受，从事惧然而止。后举孝廉，（唐李贤注引《汝南先贤传》曰：‘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

廉’也。)除阴平长、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爱之。”^① 阅读书目《氏族大全》卷五亦载:“袁安字邵公,微时客洛阳。时大雪。洛阳令按行,至安门,门闭,无行迹。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曰:‘大雪人皆饿死,不宜干人。’令举为孝廉。汉建初中,为河南尹,在职十年。论曰:‘尹者正也。’”^②《艺文类聚·天部下》、《太平御览·天部十二》亦载本事,皆有“不宜干人”“孝廉”等语词,这些语词亦见于瑞溪诗歌,《后汉书》《氏族大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为本事典据的范围,本事典据的范围应当编入于索引。但是否另立款目是一个问题,无论是用例典据范围还是本事典据范围,都是来自阅读书目,更重要的是用例典据范围与本事典据范围可以是同一诗歌同一语词的交流关系。如果本事典据范围另立一个款目,就会割裂同一语词的交流关系,这显然不益于研究交流关系。更好的方法是以典据或典据范围的数量来标记,这样不能显示用例典据范围与本事典据范围的类型,但并不影响交流关系的总体数据,可以保证总体数据的准确性。

第三,常规索引与交流索引:书名、篇名、人名与地名。

书名、人名、地名是常规索引,常规索引与交流索引不同,其中没有交流关系的信息。既然二者不同,那么常规索引不应当也作为交流索引。书名、人名、地名索引是记录书中出现的书名、人名、地名以及所在位置,以便于通过书名、人名、地名迅速找到相关内容,也有助于研究者获得相关信息。典据、典据范围的索引是查找交流关系的方式,书名、人名以及地名索引也可以是查找交流关系的方式,这是因为书名、人名、地名也可以是交流信息的载体,这与校注的内容不无关系,如果以校注方式研究交流关系,那么校注中就会书名、人名、地名的交流信息,这样常规索引也会变成交流索引。只是与典据、典据范围的索引有所不同,不是所有的书名、人名、地名都承载交流

①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17—1518页。

② [元]佚名:《氏族大全》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2册,第167页。

信息，因为书名、人名、地名的索引不是以交流信息编制为目的，但其中还是存在丰富的交流信息的。

其一，书名索引与交流信息的特殊关系。书名索引是各类书籍常见的索引，根据书名索引可以找到与书目相关的内容。比较文学文献学的书名索引在形态上没有什么不同，编制书名索引的目的也没有变化。但实际上比较文学文献学的书名索引还是存在较大差异，差异在于书名索引的构成：一是没有交流关系的书目，二是存在交流关系的书目。第一种书目属于常规的书名索引，第二种书目是常规书名索引中没有的部分。以阅读书目校注是基本原则，但是并非只能使用阅读书目，毕竟还存在没有交流关系的校注，即使存在交流关系，也不是完全不用一般书目，这是与常规书名索引相同的地方。但比较文学文献学原则上使用阅读书目校注，书名索引包含大量的阅读书目，同时也包含丰富的交流信息，这是常规书名索引没有的部分，也是设立书名索引的必要性。书名索引也是检索交流关系的工具，可以根据书名检索校注中的阅读书目，从而查到交流关系的信息。与书名索引最近的是阅读书目清单，从阅读书目清单到书名索引是重大的变化，似乎应当编制阅读书目的专用索引。但编制阅读书目的专用索引，就无法检索书目的所有信息。编制所有书目的索引，既可查到一般书目，也可查到阅读书目。其实这也是校注引用书目的目录，引用书目也是需要的信息。

其二，人名索引与交流信息的特殊关系。人名索引也是常规索引，主要是记录书中出现的人名及其位置。一本别集的文本与校注中出现大量人名，其中有本国人，也有他国人名。日本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关系极为密集，出现了很多中国人，这些人也是交流关系的载体。瑞溪周凤《卧云稿》的诗歌文本中出现了陶渊明、苏轼、黄庭坚等中国诗人的名字，此外校注原则上使用阅读书目，那么也会大量出现阅读书目撰者、编者的名字，这样人名索引必然也会成为检索交流关系的途径。人名索引与交游圈诗人清单也存在密切关系，

人名索引中出现最多的本国诗人就是交游圈诗人，通过人名索引的数据可以了解交游圈清单，从而了解潜在书目的清单。瑞溪周凤《香影斋》校注中的本国人名，是由交游圈诗人名字构成的：首先，香影是林逋诗歌的标志性因素。横川景三《梅溪号》：“千树孤山香影寒，春消息在画桥看。”^①天隐龙泽《林处士画像》：“香影诗成屡岸巾，夜寒冰锁砚无春。”^②南江宗沅《读和靖诗》：“李及未知香影句，惟携白集上归舟。”^③季弘大叔《西湖图》：“西湖以梅而重焉，梅以和靖而重焉，横斜浮动之香影也。”^④心田清播《江路见梅》：“香影更论佳句法，家家昏月水边扉。”^⑤心田此句没有直接提及林逋，但“佳句法”是指林逋。其次，没有林逋的用例。江西龙派《江南一枝，赠金吾藤公时寓禅院，故戏云》：“残月梦回僧院晓，多情香影胜空房。”^⑥心田清播《曙窗梅月》：“寒鲸罅杵初知处，香影犹残月半扉。”^⑦驴雪鹰瀾《和春谷试毫之韵》：“此花若不嫌茅舍，香影今宵和月来。”^⑧横川景三《竹里早梅》：“更有春风胜香影，无双花向竹西开。”^⑨这里出现的人名除了林逋之外，其他都是日本诗人名字。横川景三、天隐龙泽、南江宗沅、心田清播、江西龙派等都是瑞溪周凤交游圈诗人的核心成员，在这些核心成员的诗人名字中包含着林逋诗句影响的印迹，也存在着与瑞溪周凤的交流信息。阅读书目的撰者、编者与交游圈诗人的名字，是人名索引的主要部分，但也不是全部，还有其他一般书目的撰者、编者与非交游圈的人名。因而既有一般人名索引的功能，也有提供交流关系信息的功能。

① 横川景三『補庵京華續集』，『五山文學新集』卷一，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年，482頁。

② 天隱龍澤『默云稿』，『五山文學新集』卷五，1121頁。

③ 南江宗沅『漁庵小藁』，『五山文學新集』卷六，146頁。

④ 季弘大叔『松山序等諸師雜稿』，『五山文學新集』卷六，348頁。

⑤ 心田清播『聽雨外集』，『五山文學新集』別一，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687頁。

⑥ 江西龍派『續翠詩集』，『五山文學新集』別一，182頁。

⑦ 心田清播『聽雨外集』，『五山文學新集』別一，664頁。

⑧ 驢雪鷹瀾『驢雪藁』，『五山文學新集』別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169頁。

⑨ 横川景三『補庵集』，『五山文學新集』卷一，1967年，18頁。

其三，地名索引与交流关系。地名索引没有人名索引那样常见，但从地名索引可以查到诗人的地域活动范围。比较文学目录学的地名索引，是为了搜查地名的交流关系，日本五山文学别集提供了丰富的地名交流信息：一是诗文文本出现的中国地名，从这些中国地名可以了解到五山诗人感兴趣的中国地方有哪些，与地名相关的交流关系有哪些，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二是五山文学中的唐风地名，这也是一般地名索引变成比较文学目录学的地名索引的重要因素。唐风地名不是中国地名，而是日本地名的别称，由于使用了唐风地名，就产生了交流关系，这样地名索引就会变成比较文学文献学的地名索引。地名索引也有本土的大和地名，大和地名没有交流关系。这样地名索引既有一般地名索引的功能，也有检索交流关系的功能。

交流关系的基本形态、构成决定了目录与索引的款目，每一本别集的校注可以编制不同的索引。但交流关系的基本形态、构成并不是经常变化的，目录、索引的款目也有一定的稳定性。常规索引的款目最初并不是出于研究交流关系的需要，但常规索引的款目也可以用于检索交流关系，这也是索引及其款目稳定性的来源，稳定性也是编制目录、索引的重要依据。